

「實用」的演變： 民初上海雜誌譯報實踐初探

葉嘉

清末民初譯事大興，報業蓬勃。兩大潮流之下，雜誌界出現一種新穎的翻譯形式：譯報。譯報指從外國報刊取材編譯的做法。本文以這一翻譯實踐為研究對象，先溯其根源，說明譯報實踐乃源自晚清的「實用」理念，在官方及民間皆有先例；繼而以六本民初上海暢銷雜誌為例，展現「實用」在民初雜誌譯報實踐中得以延伸的過程，進而探討雜誌譯報文本最為集中的「譯叢」與「西笑」欄目，追溯其在英美報刊的資料來源，對比細讀，並分析雜誌翻譯的伴隨文本（paratext），說明這一實踐延續並豐富晚清「實用」理念，既輸入國外熱點話題，亦引入奇趣新知，兩者皆為民初社會提供參照，有同步中外、刺激思考之效。貌似零碎的譯報文本，亦可略見雜誌譯者群像。

關鍵詞：譯報、實用、雜誌、民初

收件：2014年6月9日；修改：2014年10月3日；接受：2014年12月8日

葉嘉，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師，E-mail: trapeers@gmail.com。

本文為筆者於201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之博士論文《上海通俗文學雜誌的翻譯圖景，1912-1920s》的部分成果。

Practicality and Change: The Role of Translations from Western Periodicals in China's Early Republican Magazines

Ye Ji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ritings in western periodicals that appeared in six popular magazin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an effort to historicize and contextualize, the paper associates the emphasis on urgency, societal relevance and an east-w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ith a notion of practicality (*shiyong*) rooted in the governmental reform proposals and early periodicals of the late-Qing period. The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creasingly evident in non-literary columns in the popular magazines of this period, effectively conveyed this mode of think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urban readership.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 author focuses on selected translated pieces appearing in two columns—‘translated miscellanea’ (*yizong*) and ‘occidental laughs’ (*xixiao*)—and locates the source materials in early 20th-century western periodicals.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s 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paratextual elemen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is practice not only ga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 of practicality a sense of exoticism and playful irony, but also opened a channel for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facts and ideas that somehow echoed the reality of China's metropolitan society at that time. The textual analysis involved here also provides a window through which we may get a glimpse of the practice and mentality of magazine translators.

Keywords: translations, practicality, western periodicals, early Republican China

Received: June 9, 2014; Revised: October 3, 2014; Accepted: December 8, 2014

Ye Jia, Lecturer,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trapeers@gmail.com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hapters from her doctoral thesis *Landscape of Translation in Shanghai Popular Literary Magazines, 1912-1920s* completed in 2012 at CUHK.

壹、前言

清末民初譯事大興，報業蓬勃。兩大潮流之下，雜誌界出現一種新穎的翻譯形式：「譯報」。「譯報」即從外國報刊取材編譯的做法。本論文以此翻譯實踐為研究對象，首先嘗試說明譯報始於晚清以來的「實用」理念，在清廷改革方案和早期報業已見端倪，並漸成風氣。本論文以六本民初上海暢銷雜誌為例，展現「實用」在雜誌譯報實踐中得以延伸，以適於民初社會和讀者的過程；進而探討雜誌譯報文本最為集中的兩大欄目——摘錄時聞的「譯叢」與轉載笑話的「西笑」。通過追溯其在當時英美報刊的資料來源，對比細讀，並分析雜誌中關乎譯事的伴隨文本，說明譯報實踐延續「實用」理念中追求時效、對比中西的視角，有意引入國外熱門話題，作為民初城市社會的參照，有同步中外、刺激思考之效；另一方面，晚清「實用」素有「補缺」的用意，即以外國之所長補本國之所無，時至民初，讀者群體漸趨多元紛繁，「補缺」更在「譯叢」與「西笑」欄目中衍生出獵奇求趣的色彩。貌似零碎的民初譯報文本，實與晚清翻譯傳統有明顯傳承關係，亦可從中一窺雜誌譯者群像，值得詳加探索。

貳、晚清的緣起

晚清以來，國力日衰，外交失利，上至皇室朝野，下至文人學界，都體驗到一種即將融入世界政治文化體系的迫切感。不少政府官員和文人志士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將譯書列為國家要務。改革人士亦注意到國內譯事進展緩慢，跟不上時局變化。有關藉譯書以強國的倡議，每每流露出焦慮情緒。清光緒22年（1896）內閣學士李端棻撰〈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摺〉，提倡廣設學校、譯館和報館，將治學、譯書、辦報列為時下三大要務。他試圖統籌三方面的改革，使之相互補益；有關譯書與治學互相配合的建議尤為詳盡。例如，西書譯出後可收入新學堂

課本，出自新學堂的外語人才又可繼續從事翻譯。這種改革視野，表明翻譯對強國之重要性，並不亞於教育。關於譯事，他認為：「泰西格致新學，製造新法，月異歲殊，後來居上。今所已譯出者，率十年以前之書，且數亦甚少，未能盡其所長。」（張靜廬，1954，頁6-7）言下之意，是國內西書不夠多，翻譯速度不夠快，譯書傳播也不夠廣。他又指出，只有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譯館等譯書機構還不足夠，各大縣市應自設譯書局，大興譯事，並搜羅民間譯製而官方尚無的譯書，定期增補；譯書局應「不厭詳博，隨時刻佈」，邊譯邊印，以爭取時效；譯書亦應「廣印廉售，佈之海內」（張靜廬，1954，頁7），以廣泛傳播。

戊戌變法之後，張之洞、劉坤一三次上書，繼續倡議變法自強，第三份奏疏更以促進譯事為變法要務。張之洞同樣認為當時譯書遠遠落後於時局，不合時宜。為此，他建議將譯書一事納入外使大臣的職責範圍，每位外使須在當地尋訪最新書籍，聘請該國通人（相當於「傳譯人員」）協助使團的翻譯官，在任期內完成一定字數的翻譯任務。此外，他特別鼓勵從日文轉譯西方著作和新聞，因為中日語言障礙相對較小，翻譯需時較短；而且中日兩國「時令、土宜、國勢、民風大率相近」（張靜廬，1954，頁30），經過日本人翻譯的西方書籍，多數已刪去不宜國情國體的內容，又可省去一些工夫。張之洞也提議日本使節團應多攜譯員，「廣蒐要籍，分門繙譯，譯成隨時寄回刊佈」，如此一來，譯事就能「既精且速」（張靜廬，1954，頁30）。這與李端棻呼籲「隨時刻佈」的動機一致，都是為了提高譯事時效，以求翻譯成果可儘快為社會實際所用。

上述清末各種促進譯事的舉措，無不求新、求快、求廣，這也恰是當時譯事緩慢、譯書貧乏、譯員短缺的有力證明。在這些訴求和局限下，翻譯活動若沒有統一的選譯原則作為指引，就有可能變得急而無序。為此，張之洞曾建議實行譯者獎勵制度，各省舉貢生員之中，「能譯出外國有用之書者」，可論功行賞，獎以實官或虛銜；譯書出版量

大，並切合當局要求的省市，也有獎賞（張靜廬，1954，頁30）。這些鼓勵措施表明，當局一方面急於擴大譯事規模，另一方面亦在向譯界灌輸一種注重「實用」的選譯原則。

「實用」一詞正式進入並流行於漢語詞彙的確切時間不易考證。若以早期雙語詞典為依據，略加推索，可見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823年所編《華英字典》尚無「實用」詞條（馬禮遜，2008，頁743），而1916年赫美玲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官話》已將「實用」一詞收為英文 'practice', 'practical' 條目的中文解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英華字典資料庫」），可視為詞語扎根漢語語彙的表徵。追溯晚清官方文獻，又可發現「實用」一詞乃自鴉片戰爭之後，經屢次改革嘗試，而逐漸流通於官方話語。鴉片戰爭後，國人意識到科學技術已落人後，推行洋務運動，此時「實用」主要指科學、技術等工具層面的知識。張之洞於1889年論西學，便將「算學」與「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公法學」等同列為「實用」學科（吉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1959，頁832）。甲午戰爭之後，國人發現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已躍居於前，頓覺政體改革迫在眉睫。戊戌變法前後，「實用」轉而指向政治、法律、哲學等涉及國家機器和思想體系層面。1897年嚴修奏請廢除科舉、開設經濟特科時，明言為收「實用」之效，教育新制應設「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等六科（吉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1959，頁976）。戊戌事變之後，主張變法自強的安徽巡撫王之春又在〈覆議新政有關繙譯諸奏疏〉一文解釋譯事的必要性，回應保守派的質疑：「中國已有之書，其講道精深者，必應謹守；中國未備之書，有學問切實者，不妨廣求」。「未備之書」，包括「道藝」和「體用」，仍離不開科技和政法這兩大落後於西方的領域（張靜廬，1954，頁29-31）。

由此可見，清末民初的「實用」作為一種知識系統的類別，素強調理性知識用於解決實際問題所體現的價值；有關「實用」的訴求，都在

中西對比的視野之下提出。晚清官員一再強調譯事須儘快引入本國尚無而外國已有的書籍，又表明以「實用」理念之下的翻譯活動竭力追求時效，意在補缺，旨在從西方汲取本國未有之事物。「對比」的視野、「時效」的追求與「補缺」的心理，可謂晚清「實用」理念的重要層面，與本文研討的課題亦極為相關。

「實用」理念雖然顯見於關乎翻譯的官方文本，但並不代表純然源於朝廷命令或官員提案，影響亦不限於官方翻譯實踐。在民間，尤其是民辦報業，這一理念早有體現。事實上，清末民初譯事和報業關係一直相當密切。一方面，譯界最主要的出版渠道正是報章雜誌。據統計，清末民初的文學作品，不論原創或翻譯，大多先在報刊發表，然後才結集出版（樽本照雄，2006，頁179—181）。清末民初文人不少身兼出版人、記者、譯者、作家數職（葉嘉，2009，頁10—11），更使報業和新興的翻譯行業緊密結合。另一方面，翻譯是報人獲得資訊的主要途徑，是近代報業的生存所需。晚清時期的報人，不論是在華傳教士、外國駐華人員，還是致力於西學傳播的華人，都依靠翻譯撐起報刊版面。清末強學會出版之機關刊物《強學報》以外報譯聞，京報摘錄和改革倡議三大欄目平分版面（上海強學會，1895）。梁啟超辦《時務報》，即在創刊號撰〈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即以「廣譯五洲近事」為報業四大要務之一（梁啟超，1896）。嚴復的天津《國聞報》亦闢出寬闊版面，刊登俄、德、法、英、日各國報紙消息。新聞消息依賴譯電譯報，文學刊物則倚重譯介小說。報刊翻譯量的增長在清末小說界革命和1917年開始的新文學革命尤為顯著。梁啟超的《新小說》雜誌、1917年之後的《新青年》雜誌，以及1921年改版後的《小說月報》，都奉翻譯小說為文學改革之圭臬。由此可見，翻譯和辦報在此時皆為接軌世界、同步中外的途徑，是兩大相輔相成的文化實踐。報刊具有不斷更新、與時並進的本質，以報刊為媒介出版翻譯，尤能強化翻譯時效，突顯「實用」價值。故此，在報刊翻譯中觀察「實用」原則的演變，不失為可行做法。

有關清末民初期刊翻譯的研究，近年已頗有進展。例如潘光哲（2006）曾詳細分析《時務報》各種譯稿在晚清傳播世界知識、構建公共空間的功能；杜慧敏（2007）梳理晚清期刊翻譯小說資料，展其概貌；趙稀方（2012）從《萬國公報》與《新青年》的翻譯實踐論及中國對西方文化之協商與接受；王勇（2014）嘗試解釋《東方雜誌》在中國現代文學萌芽期間翻譯與文學之互動，上述研究成果皆屬可貴。然而目前研究普遍聚焦於政治影響深遠的大型刊物，翻譯研究亦更多偏重文學，非文學類譯本研究相對稀少，溯及原文者更少。本文所涉暢銷雜誌，因有娛民之面目，又較少涉及公共話題，素來難入文學史論；貌似零散的編譯欄目，更因形態龐雜、來源模糊而鮮為人探討。然而，正因雜誌文人與讀者受眾的背景多元，取態各異，暢銷雜誌的翻譯實踐大有研究價值。以「實用」為線索，更可試將通俗翻譯文本置於晚清以來的公共語境來觀察。此外，本文亦嘗試追溯某些譯例的消息來源，還其背景語境，以表明發乎「實用」理念的翻譯欄目，的確含有連通中西社會的思維。

本文遂以民國初年上海暢銷雜誌為研究對象，探討「實用」的翻譯理念如何從晚清演入政體初改、民風漸開的民初時期，又如何訴諸愈見多元而龐雜的讀者群。民初雜誌卷帙浩繁，五花八門。因資料、時間、學力所限，本文主要以民初上海大型書局出品、壽命較長且出版穩定的六本暢銷雜誌為研究素材（表1）。

表1
本論文所涉之民初暢銷雜誌

雜誌名稱	發行年份	發行或經銷所
《小說月報》	1910—1921	商務印書館
《禮拜六》	1914—1916 1921—1923	中華圖書館
《中華小說界》	1914—1916	中華書局

表1

本論文所涉之民初暢銷雜誌（續）

《小說大觀》	1915—1921	中華書局
《紅雜誌》； 1924年更名為《紅玫瑰》	1922—1924 1924—1932	世界書局
《小說世界》	1923—1929	商務印書館

資料來源：各雜誌封面及版權頁，筆者自行整理。

清末民初上海租界林立，是中西文化交匯之處，也是國內出版重鎮。這些雜誌均自出版初期已有英文名稱（詳見附錄），表明刊方心中預設的讀者，是具備英文能力，或至少對英文並不陌生的人；雜誌內容廣泛取材於外國素材，亦屬自然。所選雜誌的內容中，翻譯一直占穩定比例，表現形式有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體裁，也有評論、報導、消息等新聞體裁，甚至見於封面、插畫等圖像元素。有關翻譯的文字資料也十分豐富，例如譯書廣告、譯作的前言後序等伴隨文本（paratext），本文均視為重要史料。

譯事和報業既成兩大潮流，加上國內對西方消息的急切需求，催生出一種特殊的雜誌翻譯形式：譯報。本文的「譯報」乃指雜誌從外國報刊取材編譯的實踐。鴉片戰爭以降，國內始有此法。魏源《海國圖志》便是編譯外國書籍和新聞所成。自此，翻譯外國報章雜誌，漸漸成為國人獲取最新時政消息的有效手段。張之洞在〈勸學篇〉（1898）提到，乙未（1895年）之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可見譯報已成潮流，不僅可引入新知，也為國人議政提供素材和參考。梁啟超所辦《時務報》（1895）和《清議報》（1898—1901），亦注重編譯外國報刊的新聞和社論。嚴復創辦《國聞報》（1897—1900）時明言：「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戈公振，1927，頁148），譯自外報的內容就是《國聞報》的主體。狄楚青辦《時報》（1904—1937），不

僅搜羅在上海能訂閱的各國報紙，還開闢專欄刊登外國報章的社論。譯報的做法在華人報界大為流行，正是一代譯者銳意追求「實用」的具體表現。換個角度而言，譯報的成品也是觀察「實用」之影響與流變的典型文本。有見及此，本文在整合雜誌翻譯史料，觀察這一理念演入民初的過程之際，尤視雜誌譯自外報的文本為重要線索，其中又以譯報文本最為集中的欄目「譯叢」與「西笑」為文本分析的主體。

參、民初的演變

中西對比的視野下提出的「實用」理念，到了民國初年仍在影響翻譯實踐。在新生共和政體之下，國人迫切希望融入世界體系，譯界亦有所回應。不少翻譯書籍的廣告，均強調譯書對於民初社會現狀的切合程度，並常以原著在其國家的效用，來說明譯書的參考價值。其中，教育為題材的譯書最注重「實用」，從譯書廣告文字可略見一二。¹ 以中華書局為例，旗下暢銷月刊《中華小說界》的譯書廣告中，《公民模範》一書「譯自美籍，以先進共和國之道德，為吾民之模範」（中華書局，1914）；《生活教育設施法》自稱「教育界最近之思潮」，「洵今教育之對症良藥，辦學者允宜人手一編」（中華書局，1915c）；《美國政治精義》建議「共和國人民自宜手此一篇，以資觀摩」（中華書局，1915a）；提倡全民儲蓄的《勤儉倫》則指出，「英國自出此書之後，儲蓄銀行增設不少。吾國財力艱窘，習尚奢靡，此書誠為對症良藥」（中華書局，1915b）。廣告每每強調譯書乃譯自西方最新著作，有意以時效為賣點。廣告常用「對症良藥」、「人手一篇」之類的短語，反映書商針對社會需求、訴諸公眾的宣傳策略，也表達借鑑西方的呼籲。幼兒教育專著《新教育法》廣告更明言，該書「風行全世界，迄今歐美

¹ 本節所選取之書籍廣告，均在雜誌內刊登半年以上，且占據雜誌至少半頁篇幅，表明是書局比較重視推廣的書籍，因而具有代表性。

各國，無不競相仿行，獨於我國寂然無聞」（中華書局，1915d），有意在歐美為中心的國際視野中檢視本國的位置，流露出一種不甘落於人後的迫切感。廣告詞聚焦於時效，強調參考價值，均是追求「實用」的表現。

以「實用」為準則的翻譯思維，同樣見於雜誌界。民國初年，中華書局旗下「八大雜誌」均以「注重經驗，主張實用」為徵稿要求（中華書局，1915e）。商務印書館的大型綜合月刊《東方雜誌》（1904—1948），徵稿條例並沒有對譯稿提出特別要求，但規定不論原創或翻譯，都以「規畫大局，陳善納誨」為錄用的首要條件，對文稿的言論導向及教育意義最為用心（《東方雜誌》編輯部，1910）。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創立的《留美學生季報》（1913—1928）更開宗明義以「借鑑」為刊物核心精神，原因是「吾國自改革以來，一切制度，大都取法歐美。而美為共和先進國，其所設施足資吾國借鑑者不少」（留美中國學生會，1915）。

由此可見，當時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等大型書局，正從譯事入手，發掘「實用」的文本。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書局，亦順應這一主流，利用自身的專長和資源，推出迎合社會各種需求的譯本。專營西書進口的上海伊文思圖書公司在廣告〈新書來華預告〉中寫道，中國實業不興的原因是「缺乏專書，無以造就人才」，因此該公司從歐美搜羅回國的新書中，就有上千種有關實業、工業的專門書籍（伊文思圖書公司，1915）。出版《禮拜六》的中華圖書館，尤精於印刷，以重印古籍和名家書畫著稱，亦擅長譯介西方美術書籍，供新式學校美術科使用。例如《圖畫學》一書，乃根據美國某一函授繪畫課本而譯出。書局又委託畫家丁慄（《禮拜六》封面的繪者）鑑定譯文質量，並作註解，方便學生參考；也歡迎訂購此書的師生隨時來函，向丁慄求教（中華圖書館，1915）。不難看出，書局深明這類譯書的價值在於傳授技藝、指導實踐，因此精心設計一系列「售後服務」，便於讀者邊讀邊學。這一

營銷策略，無疑與「實用」理念一脈相承。《圖畫學》的廣告亦明言，「西洋畫之在中國，尚在幼稚時代，雖有專門學校，而苦無良好之講義」。兩則譯書廣告都針對書籍短缺的現象，體現了晚清以來「實用」理念之下「補缺」心理的延續。

與此同時，出版業日益成熟，識字人口逐年上升，民初出版商亦將「補缺」的態度延伸至科技、教育、工商業以外的領域，滿足不同人群的興趣和需求。例如文明書局曾譯介體育常識用書《足球規例》（圖1左），廣告文寫道：「足球一道，西國刊書記載，視若專門，中國既少研究，亦無專書」，「補缺」的用意與以上兩例相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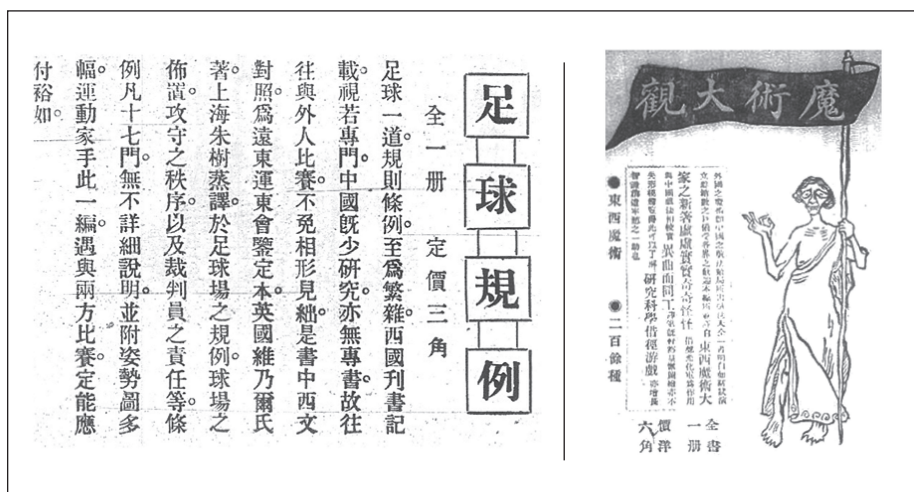


圖1《足球規例》與《魔術大觀》譯介

資料來源：左：《足球規例》譯介廣告，《中華小說界》，1915年5月1日；
右：《魔術大觀》譯介廣告，《小說大觀》，1918年3月30日。

此外，也有一些趣味書籍得到譯介，如文明書局的《魔術大觀》（圖1右）。從書商的介紹，頗能看出民初譯界一些承自「實用」又有所延伸的跡象。廣告說該書「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失形模」，譯筆和插圖都有助讀者理解；讀此書可「研究科學，借徑遊戲」，意即寓

學於樂，既富教育意義又不失趣味。此處所謂的「科學」，乃指用於變玩把戲的一些簡單物理和化學常識，而並不涉及科學原理解釋和探討。「實用」理念本源於國家革新自強的需求，聚焦於科學、政治、實業方面，往往反映精英階層的追求，本身意味極為嚴肅。反觀《魔術大觀》的自我宣傳，一方面號稱可助科學普及，有意迎合譯界「實用」主流，另一方面又強調書中充滿「虛虛實實，奇奇怪怪」的趣味，對不同背景和階層的讀者都有一定吸引力。

從上述民初譯書廣告可見，譯事長久以來所背負求知授技的使命，正逐漸從精英和官方的層面，被引介到普羅百姓之間。在民初市民讀者的品味和暢銷雜誌的定位影響下，晚清以來追求時效、意圖「補缺」的「實用」翻譯原則，逐漸出現追求新鮮趣怪的「獵奇」色彩。

肆、譯叢：獵奇的「實用」

在民初雜誌中，最具「獵奇」色彩的是摘錄西方雜聞的欄目。這類欄目可統稱為「譯叢」，每期推出幾篇百字以內的短文，內容包羅萬象，或安排在各大小說欄目之後，或安插在小說與小說之間，兼有補白功能。各雜誌對這一欄目的命名不盡相同，選錄內容亦各有側重。早期《小說月報》的〈新智識〉欄目，以介紹生活常識、科學趣聞為主，「譯叢」欄目多選錄環球趣聞，〈瀛談〉和〈遊記〉則譯介各地旅行者手記。《中華小說界》的〈談瀛〉和〈談薈〉，著重收錄西方各地風俗和奇人奇事。1920年代之後，「譯叢」在雜誌中所佔篇幅增多，名目也更多種多樣。《禮拜六》1921年第100期起增設「譯叢」，計有〈歐屑瑣譯〉、〈瀛寰瑣聞〉、〈海外瑣聞〉等專欄，內容選自外國社會新聞、歷史故事、名人訪談和笑話趣談。《紅雜誌》的「譯叢」有選譯西方史話、逸事和奇聞的〈世界珍聞〉、〈西史拾遺〉和〈求幸福齋臆墨〉，以及介紹外國電影明星的〈藝林芳訊〉。改版成《紅玫瑰》後，設有〈小小報〉、〈小思潮〉、〈滑稽艷話〉、〈中外奇觀〉等專欄，

內容則無大分別。《小說世界》的「譯叢」欄目較有條理，通常有統一主題，例如搜羅新聞奇聞的〈世界瞭望塔〉和〈風俗誌異〉，以及人物傳記專欄〈世界名畫家小傳〉和〈歐戰名人小傳〉。

顧名思義，「譯叢」欄目的內容是從翻譯而來，但雜誌極少註明消息的來源，甚至不留譯者姓名，而多稱之為「記者」，意即視譯者為提供外國消息的人士。筆者根據三點線索，推測「譯叢」的重要原文來源之一是外國期刊。

線索之一，是譯叢編輯者的自述。例如，《紅玫瑰》欄目〈東鱗西爪〉的負責人鄭逸梅曾表明某幾則雜聞譯自外文《新婦女報》（見雜誌1924年1月11日該欄目）。《紅雜誌》欄目〈求幸福齋臙墨〉的主筆何海鳴（1884—1944）也曾透露欄目素材的來源：

近得美洲華僑寄來西文雜誌多種，並有已譯成華文之小品文字，擇其數種有趣味者，送刊紅雜誌。（何海鳴編，1923，頁14）

《禮拜六》的譯者劉鳳生，負責搜集並編譯欄目〈漫浪談〉。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方式：

予平居喜閱歐美各種雜誌，偶有奇聞異事，而視為足資談笑者，輒筆之於懷中記事冊。（劉鳳生編，1922，頁38）

由此可知，「譯叢」主要來源的確包括歐美雜誌中的奇聞異事和小品趣聞。有的譯者素有閱讀歐美雜誌的習慣，偶遇合適的材料，便會嘗試投稿；有的雜誌譯者則有意識地從外國報刊中尋求翻譯素材。

線索之二，是上海雜誌素有模仿外國雜誌的做法。譯者從外國雜誌中取材編譯，亦不足為奇。《禮拜六》的創刊理念取自美國《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見周瘦鵑，1928）；1921年復刊

後，雜誌更參考了外國小說雜誌的排版方式，改頭換面（〈編輯室〉，1921）。《紅雜誌》的命名和體例都模仿英國 *Red Magazine*（嚴獨鶴，1924，頁1）；也曾引入外國雜誌中「懸賞小說」的遊戲，即由刊方提供小說開頭、讀者續寫、擇優者錄的故事接龍遊戲（施濟羣，1923）。這些例子表明，雜誌文人素有閱讀外國報刊雜誌的習慣，因此極有可能從中尋找翻譯素材。

線索之三，是上文所說源於晚清的譯報實踐，在民初雜誌界依然十分流行。例如，商務印書館旗下兩大期刊《東方雜誌》和《婦女雜誌》均注重譯介外國報章的消息。《婦女雜誌》常設〈譯海〉欄目，「選譯歐美雜誌、世界新聞」，「以收切磋觀摩」之效（《婦女雜誌》編輯部，1915）。《東方雜誌》在1910年代，每期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譯自外國報章的內容，而且來源標註完整而明確，以說明刊物能廣納各國最新論說，而且選譯態度謹慎。

本文所涉幾本雜誌，本身以刊登文學為主，內有不少短篇小說，正是譯自外國文學雜誌所登載的作品。根據筆者整理，曾被取材的英文報章雜誌，已確認的有 *The Times* (1785-)、*Pearson's Magazine* (1896-1939)（以上為英國報刊）；*Cosmopolitan* (1886-)、*McClure's Magazine* (1893-1929)、*Scrapbook* (1910-)、*Washington Post* (1877-)、*New York Times* (1851-)、*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Outlook* (1870-1935)、*Everybody's Magazine* (1899-1929)（以上為美國報刊）等等。另有為數不少的譯作，註明取材自外文報刊，但沒有提供雜誌名稱，或只註有中文譯名。文學作品大量譯自外文報刊，正可輔助證明六本雜誌確有譯報做法。從上述三點可以推測，雜誌「譯叢」與晚清以來的譯報實踐應有深刻聯繫。

正如前文所述，清末譯報實踐素有「實用」理念的滲透。時至民初，在暢銷雜誌語境中，兩者關係依然緊密。以雜誌翻譯小說為例，已不難察覺「實用」的延續，尤其是對時效的追求。某些譯自雜誌的短篇小說，在原著出版後不久已譯成，表明譯者有意從最新期刊中尋求翻譯

材料。例如《禮拜六》偵探小說〈亞森羅蘋之勁敵〉在1914年12月分兩期出版，原著 *The Radium Robbers* 出自美國 *McClure's Magazine* 1914年7月號，相距僅5個月；另一小說《毒札》譯自美國 *Cosmopolitan* 雜誌，原著 *The Germ Letter* 在1914年7月14日刊出，在上海出版日期是1914年7月25日，相隔不足兩週。對於二十世紀初航海運輸的速度而言，這種翻譯時效可謂驚人。

「實用」理念的滲透，亦體現於這些翻譯小說向讀者傳遞知識的意向。以〈毒札〉為例，譯本和原著的標題之下、故事之前均附有一段文字，形式近似序言（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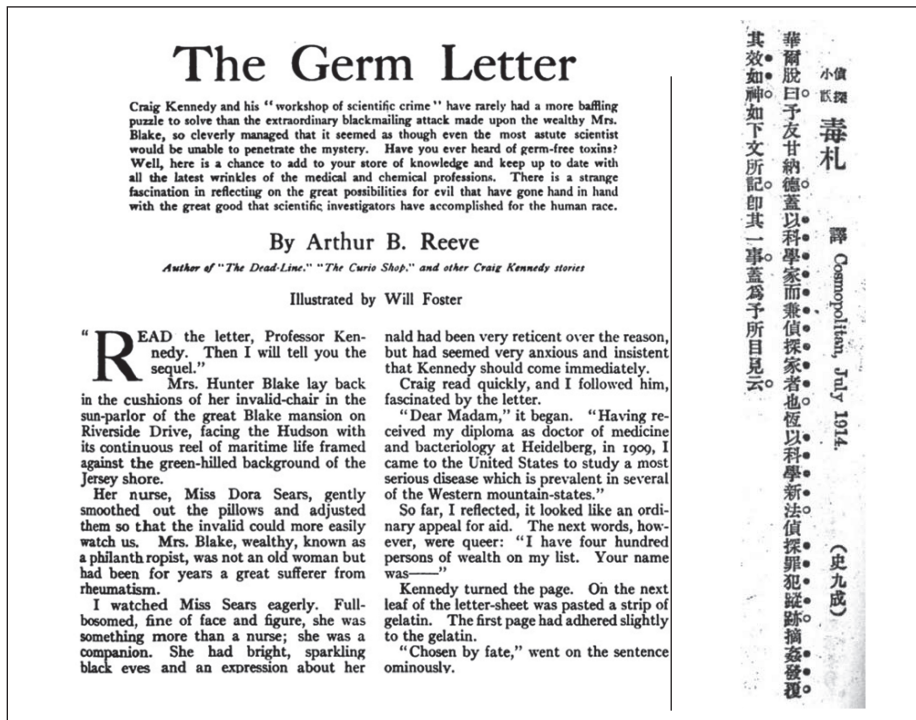


圖2 〈毒札〉及其原著 *The Germ Letter* 首頁對照

資料來源：Reeve, 1914；史九成譯，1914。

〈毒札〉的序如下：

華爾脫曰：予友甘納德，蓋以科學家而兼偵探家者也。恆以科學新法，偵探罪犯蹤跡，摘姦發覆，其效如神。如下文所記，即其一事，蓋為予所目見云。（史九成譯，1914，頁1）

這段序是「華爾脫」的自述，故事亦由「華爾脫」以第一人稱（「予」）角度來敘述。在英文原著的序中，並沒有對應「華爾脫」的英文姓名，只有主人翁大偵探 Craig Kennedy，即譯本中的「甘納德」，以及案件的當事人 Mrs. Blake。通讀原著後不難發現，「華爾脫」其實是偵探甘納德的醫生助手 Walter Jameson，兩人的關係正如經典偵探小說人物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和華生 (John Watson)。在此，譯者有意呼應福爾摩斯故事系列以及明清白話小說中「說書人」的敘事模式，讓擔任敘事者的故事人物華爾脫在開場白中提早登場。譯文這種敘事結構的提示，在原著中是沒有的；對同類小說經典的呼應，也比原著明顯，可視為迎合讀者閱讀習慣的體貼處理。

華爾脫所「曰」的內容，除了突顯偵探甘納德的神探身份，亦特別提到他善用「科學新法」。這兩點則可在原著的序言找到相應內容：

Craig Kennedy and his “workshop of scientific crime” have rarely had a more baffling puzzle to solve than the extraordinary blackmailing attack made upon the wealthy Mrs. Blake, so cleverly managed that I seemed as though even the most astute scientist would be unable to penetrate the myste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germ-free toxins? Well, here is a chance to add to your store of knowledge and keep up to date with all the latest wrinkles of the medical and chemical professions. (Reeve, 1914, p. 244)

序中先初步透露故事情節，充滿吸引讀者的意圖，似由作者或刊方所寫。從文中的問句和人稱代詞「you」，更可肯定序言是面向小說讀者而寫成的。文中又稱，是篇小說可助讀者獲得新知，了解醫學和化學領域的最新動向。對比兩篇序言後可知，譯者從原著序言提取了故事兩大賣點，一是偵探情節，二為科學新知。譯者從近期外國雜誌選譯小說，又特別選譯運用最新科學知識寫成的偵探小說，既迎合晚清以來福爾摩斯系列所形成的閱讀潮流與習慣，亦可滿足洋務運動以來民眾對西學和科技知識的嚮往和好奇心理。不論有意或巧合，這篇小說背後的譯報實踐，恰恰是「實用」的典型體現。

譯報傳統下的小說翻譯秉承「實用」理念，尤其是追求時效和傳播新知方面；同一傳統下的「譯叢」欄目，雖然多為獵奇搜怪，看似零散瑣碎，但翻譯速度之快，搜集範圍之廣，社會觸覺之敏銳，亦足見「實用」的延續。最可體現「時效」的例子是有關外國名人消息的「譯叢」。1921年，美國大實業家洛克菲勒 (John David Rockefeller, 1839-1937) 的兒子，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在華醫療信托基金到訪中國，途經上海、天津和北京。《禮拜六》〈海天拾雋〉欄目曾刊出小洛克菲勒在華的一些訪問資料：

舉世驚羨之美國煤油大王駱克非而 (John D. Rockefeller)² 之子此番過滬，有詢之者曰：君家以何術致富若此？曰：有三道焉。一善謀，二善積，三善用。又有詢之者曰：聞君此番在京搜購美術品約八萬餘金，有其事否？曰：此謠詠耳。吾視金錢之可貴，一如常人。天下惟浪使金錢者，雖富終必破產，予以為世間富者對於社會負有極大責任，蓋以富者之一舉一動，恆為他人所效尤也。（劉鳳生譯，1921，頁6-7）

² 筆者案：疑為 'Rockefeller' 之誤印。

該則消息見刊日期是1921年10月29日。通過調查這一日期前後的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新聞資料，可知小洛克菲勒在1921年8月18日啟程訪華（圖3左）；在華期間最重要的行程，是在9月中下旬為洛克菲勒信托基金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舉行揭幕儀式（圖3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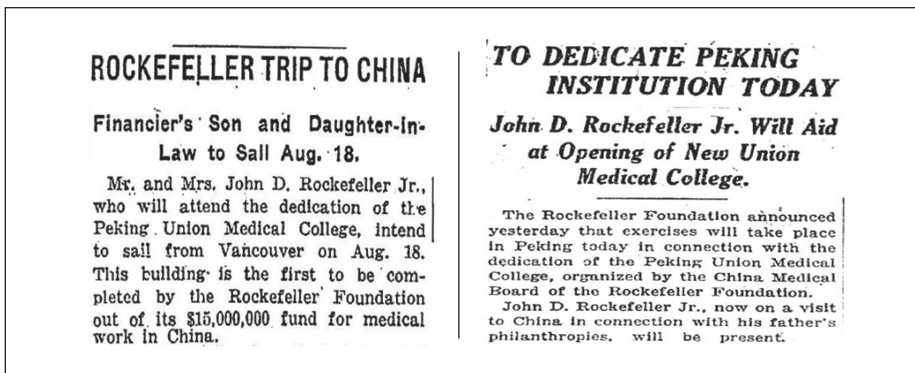


圖3 《紐約時報》洛克非勒之子訪華新聞（左：1921年7月31日；右：1921年9月19日）

資料來源：“Rockefeller Trip to China,” 1921; “To Dedicate Peking Institution Today,” 1921.

北京協和醫院是洛氏在華醫療慈善的一大創舉，洛氏之子訪華，自然引起當時媒體和民眾對於世界首富的關注。前述的雜誌譯者特別注重轉述洛氏之子對於財富與地位的看法，亦澄清了洛氏擲鉅額購買藝術品的謠言，從而傳遞富人當仁的觀點。這些內容均來自口頭訪談，而且從訪華開始到譯文出版，時間大約只有一個月。因此，消息的來源不太可能是成書，而極可能是報章雜誌。至於訪談內容是經雜誌譯者從英文譯出，還是根據中文報章所轉載的傳譯內容而編成，如今實難考察。但這一消息的產生過程，無疑涉及語言轉換和翻譯實踐。這則消息及時附和時下新聞事件，頗具譯報傳統對時效的要求；消息藉訪談而提倡謹慎的消費觀念，以及富人之社會表率作用，表明刊方試圖從名人時事中引

出正面訊息，以訓誨讀者；對於貧富日益懸殊的上海都市社會而言，亦不失為一個及時回應。這兩點與雜誌翻譯一貫注重切合社會狀況的「實用」理念，都是一致的。

1921年到訪中國的外國名人，還有英國報業和出版業大亨北巖爵士（Lord Northcliffe，本名 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1865-1922）。北巖爵士在全球報業深具影響力，他的報業集團在上海設有新聞中心，旗下《泰晤士報》（*The Times*）、《每日鏡報》（*The Daily Mirror*）和《觀察家報》（*Observer*）亦銷往中國。因此，是次訪問特別得到滬上媒體關注。11月中旬，上海《申報》已刊出北巖爵士即將到滬的消息。抵滬當天即11月20日，《申報》又有題為〈北巖爵士今晚抵滬〉的報導，並透露《申報》館將派員前往迎接。英國方面，《泰晤士報》在11月24日引述上海方面的報導（圖4），回顧爵士在華訪問的行程，包括參觀《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和《申報》，亦指出爵士訪滬時極受重視，表明英國在華勢力依然穩固；11月28日則有爵士結束訪問，離開中國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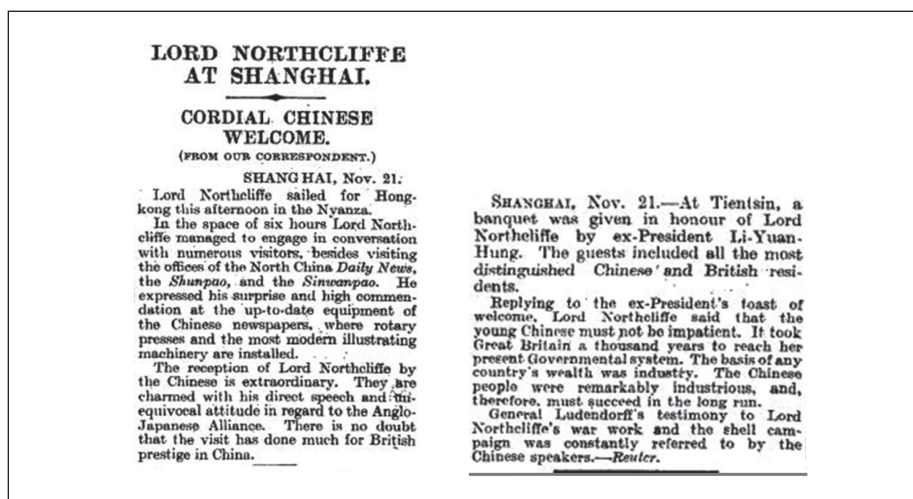


圖4《泰晤士報》北巖爵士訪華新聞

資料來源：“Lord Northcliffe at Shanghai,” 1921.

綜觀中英文主流報紙可知，上海與英國方面對此事的報導是幾近同步的。時至12月中，《禮拜六》雜誌刊出一則名為〈英國北巖爵士的譚話〉的訪談錄（王鈍根、陳蝶仙、周瘦鵑編，1921）。這則「譯叢」的內容不同於上述嚴肅的新聞報導。它既不羅列訪問的路線或行程，也不探討訪問對於中英外交的影響，反而是轉述爵士對於時下熱門話題的看法，及其本人的一些生活經歷與情趣，包括旅行、讀書和婚姻的心得。譯者對於訪談錄的來由，作了以下陳述：

北巖爵士 (Lord Northcliffe) 是倫敦泰晤士報的主人。這次來華，他的言論，喧傳各報紙上。我國人士，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我且不必多說。以下一篇是 Bert L. Kuhn 君述北巖爵士在滬寧車中和客人隨便所譚的話。零零碎碎，前後並不相接，但是說的也很有趣。因此把他譯出來，以示愛讀本刊者。（劉威閣譯，1921，頁6）

從譯序可知，當時國內有關北巖爵士訪華的媒體報導已非常豐富，讀者對此亦已十分熟悉。譯者一方面關注熱門新聞人物，緊貼社會話題，及時發掘相關文字素材，並迅速譯畢刊登；另一方面，譯者又不再從常規新聞報導中選取翻譯素材，轉而譯介花邊新聞和談話錄，展示新聞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面目。此外，譯者強調這篇是「隨便所談的話」，「零零碎碎，前後並不相接」，但重點正是散漫瑣碎中的輕鬆和趣味。譯者又提到，北巖爵士接受訪談的場景是在滬寧火車的旅程中，更帶有閒談的興味。這則譯例表明，「譯叢」在追求時效、貼近時事的同時，仍在秉持雜誌一貫的消閒品味，照顧讀者的閱讀興趣。換個角度而言，雜誌譯者正是以零散瑣碎、趣味盎然的「譯叢」為平台和途徑，一邊追蹤並回應時事熱點，一邊為熱門話題補充邊角材料，並將主流新聞媒體中的潮流引入休閒消遣的雜誌界，延伸至更廣闊的讀者群。

這則譯文的原文無從稽考，作者 Bert L. Kuhn 其人的資料亦十分稀少。筆者僅從《紐約時報》的一則訃告（圖5）中找到有限訊息。據訃告所言，這位 Bert L. Kuhn 是來自芝加哥的記者，長駐遠東地區；訃告發出地為上海，可推測記者滬辭世。換言之，〈英國北巖爵士的譚話〉所依據的英文原文，極可能是一位美國駐滬記者在上海所寫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第一刊行媒介，亦極可能是在上海發行的英文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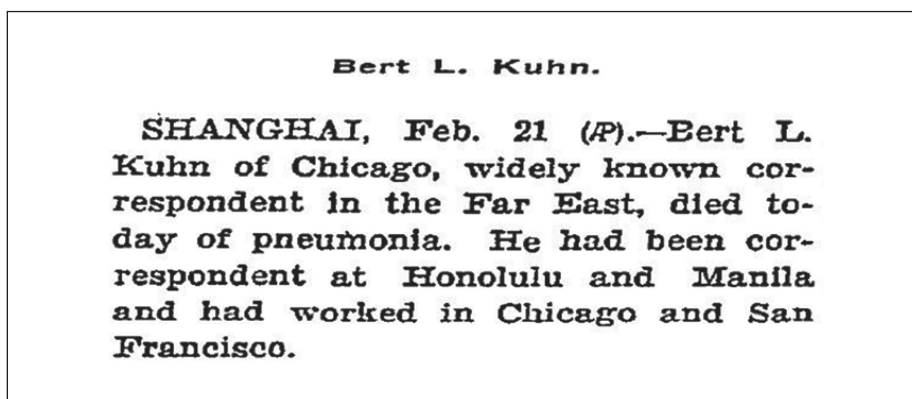


圖5《紐約時報》Bert L. Kuhn 訃告
資料來源：“Bert L. Kuhn,” 1926.

從以上兩則譯例可見，暢銷雜誌譯者確實會因應本地時事熱點，及時向讀者傳遞輿論動向。此外，亦有譯例表明，雜誌譯者會從外文報章取材，將外國社會動態引入中國。例如，《禮拜六》另一「譯叢」專欄〈瀛寰艷訊〉在1921年6月曾刊出以下消息：

美國詩家谷消息：一千九百二十年科克一府男女之結婚者凡四萬二千五百〇三起中，以兩日結婚者為最多。據該府結婚執照部部長蘭格納 L. C. Legner 氏云，每值雨集霧障之天，男女獨處，輒苦寂寥，於是夢想及於小樓爐火雙影並頭之樂，而欲言情愛，締鴛結矣。是故兩日之來請結婚執照者，較晴朗之日為多。惟今年

婚者較少，殆以人多失業屋價騰貴之故云。（情人譯，1921，頁12—13）

「詩家谷」很可能是‘Chicago’的譯音；「美國詩家谷消息」的開篇方式，完全符合新聞報導的格式。根據以上假設，有「科克」的譯音、人名‘L. C. Legner’以及有關婚姻宗數的數據作為可靠線索，筆者從有關資料庫中找到一則地方消息，相信是這則「譯叢」所依據的資料來源。這則英文消息刊於美國奧勒岡州的一份小報（參見圖6），見報日期距譯文出版不足兩個月。

經對比後可知，原文與譯文的內容要點基本一致，例如天氣、就業、房租等問題與結婚率的關係；相關數據亦如實轉錄。最不同處是對不同論點的篇幅安排。原文用基本相等的篇幅，陳述兩個事實，一是雨天結婚率偏高，二是失業率和高租金導致結婚率偏低；在譯文中，前者的敘述篇幅明顯遠多於後者。英文報導的結尾，稍有流露對於經濟狀況阻礙愛情結合這一現狀的惋惜，譯文似乎沒有表露類似的情緒。從整體上看，譯者似乎對於「雨天結婚的人比晴天多」這一事實更感興趣，有關描寫如「雨集霧障之天，男女獨處，輒苦寂寥」，「雙影並頭之樂」一類，亦可見譯者的幻想和筆力。對於經濟狀況之於婚姻的影響，則一筆帶過。在此，譯者的翻譯策略，顯然更關乎趣味性，而不甚注重原文報導的完整面目和輿論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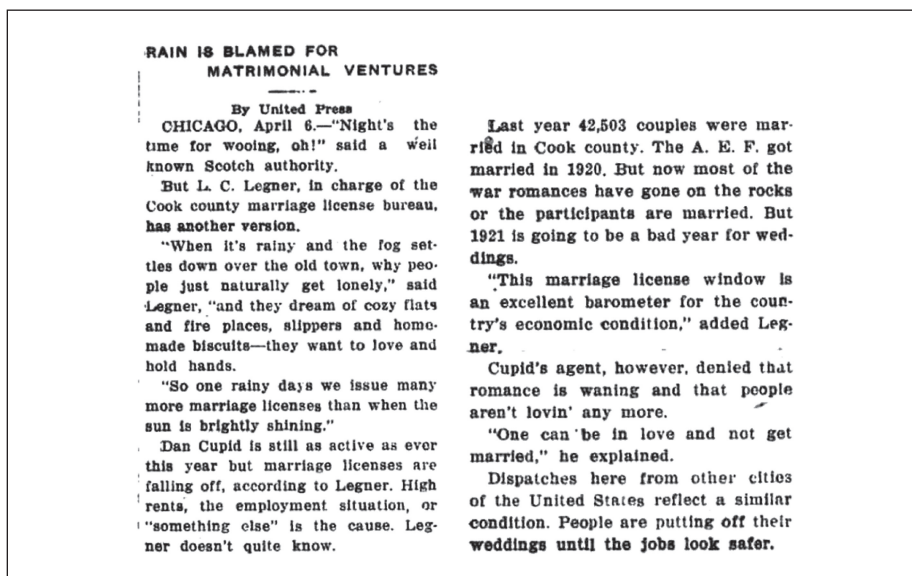


圖6 The Dalles Daily Chronicle 芝加哥消息一則

資料來源：“Rain Is Blamed for Matrimonial Ventures,” 1921.

這一則消息所在欄目〈瀛寰艷訊〉，專門報導有關男女情愛的奇聞軼事。同期欄目還有兩則消息。一則講述巴黎郵務局有意大幅提高情書郵資，逼促戀愛中的男女儘快結束現狀，步入婚姻，從而改善一戰以後人口暴減的趨勢；另一則報導述美國費城一名女子跟蹤一名年輕商人去環球旅行，只為在途中可伺機向他求愛。前文提到小洛克非勒訪華的譯例，載於1921年10月25日〈海天拾雋〉欄目。同時刊出的報導還有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趣聞，還有好萊塢默片明星胖子亞拔格兒 (Roscoe 'Fatty' Arbuckle, 1887-1933) 被控強姦一案。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1917至1921年間陸續譯入中國，發表在《學藝》、《改造》、《科學》等科學雜誌上（許步增，2008，頁17-29）。亞拔格兒一案，亦恰恰發生在1921年秋天。³ 從中可見，欄目譯者的話題來源，正是時下名人的最新軼事。

³ 最早的報導見於《紐約時報》1921年9月11日，題為“Roscoe Arbuckle Faces an Inquiry on Woman's Death”。

放眼其他暢銷雜誌的「譯叢」欄目，《紅玫瑰》設有〈海外逸話〉，專門古怪事件，如懸疑案件、畸形生物、原始部落習俗等等；《小說世界》的〈世界第一〉羅列各種世界之最，〈世界談屑〉轉載各種有趣數據和百科知識，〈世界瞭望塔〉（圖7）則譯介科普新知，如最新科技發明，天文地理異象等等，每期附有豐富的照片資料。這類「譯叢」多由譯者從不同文本來源搜集、編輯而成，表明雜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依據的原文，不一定是某一部特定作品或某一個外來文本，也有可能是一組外來文本群。雜誌譯者工作過程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根據某種線索（例如專欄主題、社會話題）來搜集和組合從各方而來、體裁各異的外國文本，藉由翻譯將之呈現。每一個固定的「譯叢」欄目，幾乎都有其編譯的線索和主題，既銳意追求時效，傳播新知，貢獻話題，亦著意求奇求新，處處可見「實用」的理念延續。



圖7 〈世界瞭望塔〉⁴

資料來源：《小說世界》，1923年4月6日。

⁴ 該期內容包括「龍形汽車」、「龍柱」（即龍捲風）、「避火皮」（即防火衣）以及「三個製造真空管的大家」。

伍、「西笑」：諧趣的「實用」

民初暢銷雜誌的非小說類翻譯文本中，除了介紹西方奇聞軼事、花邊新聞「譯叢」，還有譯介外國笑話的欄目，可統稱為「西笑」。「西笑」與譯叢類似，也源於外文材料，製作過程涉及翻譯實踐；篇幅短小，有補白之效，散見於雜誌各頁，在1920年代尤為流行。在本文所涉雜誌中，較為固定的「西笑」欄目包括《禮拜六》的〈外國軒渠錄〉、〈歐西笑談〉、〈海外諧乘〉和〈西諧拾遺〉；《紅雜誌》的〈笑林〉、〈滑稽尺牘〉和〈雙紅閣諧乘〉；《紅玫瑰》的〈西方諧談〉、〈滑稽艷話〉；《小說世界》的〈捧腹談〉和〈噴飯錄〉。有關編者亦曾透露欄目取材自外文報刊，例如〈外國軒渠錄〉的譯者夏健秋曾表明：

歐美雜誌間有小品趣聞，著墨不多，但神味雋永，的屬可喜。偶爾舊篋，得斯譯稿，略為改竄，投之禮拜六。（夏健秋，1921，頁26）

「西笑」欄目譯者極少選譯以諧音、歧義為笑點的笑話，因為譯入中文後，這些語言特色難以得到重現。晚清早有譯者意識到指出俗語、歇後語、笑話等涉及特定文化背景的文本，是難以完全譯出的（尊，1910）。1920年代的雜誌譯者傾向於選錄對時下社會和家庭生活有諷刺意味的笑話，對讀者甚有參考價值。以下四則皆摘自各雜誌中出版時間較長，而且聲明取材自外文資料的笑話欄目：

竊賊道：我們真是沒有張開眼睛，這是一家律師的住宅啊。常常說，無論那個人做什麼事情，終不要去親近律師，凡是進了律師的門，一定要弄完了他所有的錢財才罷休。我現在沒有什麼東西

失去，已經是萬分的僥幸。還敢偷他的東西嗎？（馮霽虹譯，1924，頁46—47）

律師謂黑人曰：湯姆，汝欲我為汝辯護乎？然則汝以何物酬我？湯姆答曰：家有一騾及小雞數隻，鴨數頭。盡以酬君可也？律師曰：甚佳，惟汝須先告我所犯何事？湯姆曰：天乎，彼控我偷一騾及小雞數隻鴨數頭耳。（唐振常譯，1922，頁7）

病者曰我之腦有如白紙一張，凡事隨記隨忘，君將何以教我。醫生曰：然則為尊腦善忘，故我不得不向君先索藥費。（唐振常譯，1922，頁7）

慈善家：「你父親為什麼不去工作，卻跑來做乞食呢？」乞食之子：「那是因為他愛吃酒的緣故。」善家：「那為什麼要吃酒呢？」乞食之子：「要吃了酒才好放下臉來乞食啊。」（憶秋生譯，1925，頁數從缺）

以上笑話的人物角色都帶有現代都市社會的烙印。自由執業的律師和醫生，是社會分工高度精細化，商品市場發展成熟的階段才出現的職業種類。慈善家、乞食者亦是經濟高度發展、貧富懸殊加劇之下出現的典型人物。四則笑話都在調侃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深刻矛盾。律師表面上辯護正義，實際上謀取暴利，令窮人得不償失；本應仁心仁術的醫者，卻在乎診療費多於病人的病情；乞食者酗酒，是為了放下尊嚴去乞討，這固然是慈善家難以理解的生存狀態。

這類針對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和精英階層的笑話，在「西笑」欄目中最為常見，同樣的矛盾在商家和客人、侍應和食客、債主和債戶之間不斷上演。笑話表面上有自嘲亦有暗諷，實則充滿經濟劇變和社會分化下普通市民的焦慮與無奈。由此可見，刊方和譯者的確意識到，民初上海市民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日益懸殊，價值觀和人際關係亦隨之改變。笑話的首要功能是使人發笑，笑話欄目亦沒有明顯意圖去針砭或改

變社會現狀。刊方和譯者能讓讀者看得明白，笑得出來，就自然引起了非精英階層的共鳴感。

這些譯介的笑話能博上海讀者一笑，恰恰說明此時的上海與西方社會確有共通之處。上海自開埠起，一直受惠於租界制度的保護與扶助。到了民國初年，上海已成長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大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難免會面臨各種經濟特權和階層關係帶來的壓力。雜誌選譯這類笑話，恰恰說明刊方和譯者已意識到上海已具有西方現代社會的核心特質，亦開始出現相應的社會矛盾。當時西方文本中的光怪陸離、嬉笑怒罵，幾乎都可在上海現實中找到相似之處，而令上海市民產生同感。從這個角度而言，「西笑」正正是借助翻譯同步中外的特殊例子。

「西笑」另一類常見題材，是男女婚戀問題，尤其是女權對傳統婚姻的衝擊。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國女權運動的中心。⁵ 近代女權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爭取戀愛和婚姻自由，擺脫父權的束縛。時至1920年代，民國政府風氣漸開，於各大省市都設有女子學校；女子與男子一樣，從啟蒙時期開始接受平等教育。在法律上，婚姻自主亦成為女子的基本權利。以上海為據點的雜誌文人，不少亦曾擔任女校的導師，或經辦女性雜誌。例如，包天笑曾任教於上海城東女學，創辦《婦女時報》（1911—1917）；中華圖書館的核心文人如周瘦鵑、王鈍根等，共同編輯《女子世界》（1914—1915）；陳蝶仙則編過《眉語》（1914—1916）。這些雜誌都以新式女子為目標讀者，且與商務印書館綜合性月刊《婦女雜誌》幾乎同屬一個時期。上海雜誌文人與女界精英亦有密切往來。例如天津《大公報》編輯、北洋女子公學創辦人呂碧城（1883—1943），於1920年代加入南社，散文與詞作曾刊於《禮拜六》和《社會之花》（呂碧城，1921a，1921b，1924a，1924b），《香艷雜誌》亦曾

⁵ 筆者曾從近代女學和女子期刊的興起過程，來論述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女權運動中心的觀點。詳見葉嘉（2009，頁7—8）。

登出呂碧城的照片（〈文豪呂碧城女士〉，1914）。

雜誌文人亦公開表明支持女子爭取戀愛自由。《禮拜六》的編者王鈍根，就曾因為某篇投稿小說講述一對沒有感情的男女最終成婚的故事，而拒絕刊登。為此，他在雜誌借〈編輯室啟事〉欄目公開致信投稿人，解釋拒稿的理由：

蓋夫婦之樂，在乎愛情。彼愛情既移，豈可強合。君方以不得如願為恨，我則轉為君賀，可免卻將來精神上無限痛苦也。（王鈍根，1921，頁53）

作者是否支持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竟成了選錄的條件。刊方在稿件篩選中，已明確表達，支持以情為本的婚戀自由。

雜誌譯者在翻譯外國言情小說時，亦時常挑選自由戀愛、結局美滿的故事。例如，翻譯小說《愛波影》中，一女子愛上窮小子，父親不允，後來女子施計，讓父親了解愛人的優點，終得父親認可。小說的譯者就在譯後記中感慨結局之幸福，哀嘆中國婚姻的不自由：

吾每聞吾國社會中婚姻不自由之慘劇，未嘗不盡然情傷也。讀此篇前副，幾幾攸羅場矣。後此漸入佳境，慈光霽色，笑逐顏開。……試翻《同命鴛鴦啼血》等說部，知此為絕大幸福矣。（如深譯，1914，頁37）

翻譯而來的言情小說，有的是大團圓結局，也有的是悲劇收場。某些譯者甚至不滿結局太慘，而作續篇圓夢。《禮拜六》言情小說〈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譯者周瘦鵑不滿女主角因男方父親阻撓，而愛情無果的悲劇，因此複製原著小說的梗概，再作續篇〈似曾相識燕歸來〉，還自由戀愛的男女一個圓滿結局。這些編輯和改寫自由的文本跡象，既證明刊

方和譯者公開支持婚戀自由，也表明他們視雜誌空間為探討時事、發表言論的平臺。

雜誌文人支持女子解放，尤其支持婚戀自由，但也同時從日益自由的女界觀察到不良趨勢。這些憂慮，在原創和翻譯作品中都時有呈現。

《禮拜六》原創小說〈自由果〉，女主角婚後打著戀愛自由的幌子，在外行為不檢點，以致家族和個人名譽掃地。女子在結尾道：

現在我已追悔不及了，只能勸勸天下女同胞，把我做個前車之鑑罷。（徐文烈，1921，頁45）

又如翻譯小說〈瑪伊亞公主小傳〉，主角瑪伊亞自幼被禁錮在城堡裏，一朝逃脫，得了自由，就放浪形骸，結果傷及自身。譯者在篇末道：

青年無識之女流，多假自由之名，而妄施其情愛，以致沾泥墮？如瑪伊亞之流離漂泊者，何可勝數。……知瑪伊亞之萬不可學，嗚呼可以鑒矣。（天白譯，1915，頁52）

雜誌文人透過虛構和翻譯，試圖以反面例子告誡女子，勿以戀愛和婚姻自由為放肆的藉口。

在上述雜誌著譯作品的觀照之下，「西笑」欄目一些以男女婚戀為調侃對象的小文，在滑稽之餘似乎另有深意，傳遞了刊方對婚戀過分自由的擔憂。《禮拜六》曾有譯作〈自由婚姻之滑稽劇〉，將英文原文與中文譯文一併刊出，整理如下：

表2
〈自由婚姻之滑稽劇〉之英中對照

戲劇	Drama
第一幕 彼等之目光相遇矣。	ACT 1 Their eyes met.
第二幕 彼等之唇吻相遇矣。	ACT 2 Their lips met.
第三幕 彼等之靈魂相遇矣。	ACT 3 Their souls met.
第四幕 彼等之律師相遇矣。	ACT 4 Their lawyers met.

資料來源：北京繆子譯，1922，頁9-10。

譯者透露，是篇譯自「某西報」的一篇諧文，內容「諷刺自由婚姻」，且「其文研練精妙」。譯者似乎有恐笑話太精煉，又在文末加以補充。這位譯者將第一幕的「目光相遇」解釋為「弔膀」，即勾搭之意，此為陝西俗語；又解釋「律師相遇」意即離婚。這些補充說明，都是譯者為讓讀者讀懂這則笑話而下的工夫。笑話有戛然而止之感，暗諷自由結合往往結束得唐突莫名；律師的加入，顯出男女之情的脆弱和人際關係的冷漠。笑話巧用戲劇體裁，又讓人感嘆婚姻如兒戲。刊方選錄這則笑話，正可以為當時沸沸揚揚的婚姻自由運動作一反襯。

若以婚戀自由的話題為線索，縱觀1920年代雜誌文本，又可發現「西笑」、「譯叢」與雜誌的小說作品（包括原創和翻譯），往往有相互呼應、你唱我和的效果，一同表達刊方文人對於時下熱點的觀察與思考。刊方文人一面借助翻譯、評論等手段表達觀點，一面亦以原創作品為之呼應，針對時下某些思潮提出尖銳反詰。例如，以下一則「譯叢」就直接點出婚姻自由的弊端：

世界各國離婚的案子最多，目下推美國為第一，而尤以紐約一帶為佔多數。這就是因為結婚太自由，所以離婚也離得太自由了。
（劉鳳生譯，1922，頁38）

譯者這則消息指出離婚率高的事實，並以美國為典型。結婚太自由，以致離婚也過分自由的說法，是原文已有的觀點，還是譯者自己的意見，實難考究。但此處譯者無疑也是以西方社會事實作為參照，指出婚姻過分自由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婚姻失敗。這一則消息引出了刊方和譯者對新時代男女關係、家庭結構之變化的一點憂思，亦指出了中西婚姻現狀的一點共性。

與此同時，一篇原創小說〈自由戀愛的結果！做尼姑〉如此描述一對男女「自由戀愛」的過程：

育芳既崇拜羅素與他的女生勃拉克女士所創的戀愛自由後，他在遊藝會中就挑選了一個志同道合，崇拜新文化的那學生為友。
（李允臣，1921，頁33）

從以上人物設定，可知作者刻意將戀愛自由與方興未艾的新文化思潮連繫在一起並且提到新文化陣營奉之為師的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勃拉克 (Dora Black)。故事中的情侶在鬧市的酒店幽會，遭到旁人側目，心生委屈，於是埋怨中下階層市民不懂「戀愛自由」：

此地往來人物都是些下流社會中人，他們瞧起來，總疑我們是一對野鴛鴦。因為他們決不知道那羅素先生所倡的戀愛自由主義。
（李允臣，1921，頁33—34）

小說中一再出現羅素的名字。羅素在1910年代末由新文化陣營介紹到中國，1920年更於北京講學。羅素重視人類本能的快樂，對戀愛婚姻持開放態度，在個人生活中亦奉行此道。羅素訪京期間，勃拉克女士亦陪同在旁，他們的經歷相信已為人所知。作者將羅素寫入小說，並非因為他

的哲學和邏輯學，而是因為他的戀愛自由主張對年輕一輩的影響。故事中一對主角都是熱心於新文化的新式學生，生活舉止卻過於自由，敗壞風氣。作者似乎有意把這些行為歸咎於與羅素關係密切、以學生為啟蒙對象的「新文化」。

另一篇小說〈婦女的心〉，則描述了一個以自由為藉口，四處濫情的男學生：

男的姓趙喚友聲，是中學畢業生。生平最嗜好哲學，最崇信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張潛鷗，1922，頁46）

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導師，其學說由胡適介紹到中國。杜威之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亦如羅素。《禮拜六》把他的實驗主義，與大膽「實驗」戀愛自由的男學生混為一談，又是對「新文化」思想的質疑和嘲諷，矛頭直指胡適及以北京為基地的新文化圈子。

《小說世界》同樣發掘「戀愛自由」之負面效應的題材，寫作中亦經常提到新文化運動。例如，原創小說〈街讖記〉中的主人翁，正是一個青春期適逢新文化浪潮，因而深受其害的少年：

大約是十八歲的光景，他的情慾漸漸發動了。後來在家中閒著沒事，覺得很無聊賴。這當兒，正是新文化浪潮最澎湃的時候。什麼女子解放咧，自由戀愛咧，這些新名詞，各處都傳播到，委實可算是無遠弗屆咧。葉久明既然在情慾熱烈的時期，便把那自由戀愛這四個字誤解起來，循著情慾的途徑去鬼混。（禹鐘，1923，頁數從缺）

在作者和刊方眼中，「自由」和「解放」無疑是源於新文化運動並隨之

廣傳的流行用語。誤解「自由」和「解放」而造成的惡果，亦是伴隨新文化運動而生的社會問題。這一時期，暢銷雜誌中諷刺婚姻自由的「西笑」，與有關濫用婚戀自由的小說，正有互相呼應之勢。實際上，羅素、勃拉克1920年相偕來華，其言行身教深深衝擊倫理舊俗，在知識界早已引發婚姻自由與女性解放的討論。《婦女雜誌》、《現代評論》、《莽原》、《婦女週報》和《京報副刊》上的辯論尤為激烈（呂芳上，2001，頁31—55）。在這一時期，暢銷雜誌的刊方、作者和譯者在諷刺社會現象的同時，亦開始參與「婚姻自由」這一社會文化議題的討論，加入精英及主流期刊的對話。京滬新舊文人的互動，精英與通俗的對峙，固非本文論證主旨，但確實在暢銷雜誌「實用」翻譯欄目可見一點線索，可供日後詳加探索。

陸、結語

有關「譯叢」和「西笑」及其同時期文學著譯作品的探討，基本展現「實用」理念在民初六本暢銷雜誌譯報實踐得以延續，並衍生出獵奇諧趣的內涵，從而貼合讀者品味的過程。「譯叢」的西方雜文趣談、名人軼事，多取材自當時發行的外文報刊，甚至與外國時事同步。「實用」於晚清素與強國、改革、教育相關，意味嚴肅，刊方和譯者取其反映現實、重在求知的內涵，著重發掘花邊新聞和小道消息，供讀者消遣，同時亦在翻譯中植入因時制宜的教育意義，供讀者參考。「西笑」有意針對民初上海因經濟發展、權力結構和人際關係改變而產生的各種矛盾，連通東西中外現代城市的社會問題，在諧趣中為讀者營造共鳴感與團體感，亦滲入刊方和譯者的憂慮與思考。從有關婚戀自由的文本更可知，雜誌文人一方面透過「譯叢」和「西笑」展現與上海社會時事相關的西方事實，以資參考；另一方面，又借助翻譯和寫作，針砭時下新興思潮，批判思考新文化的現象，參與時下公共話題的討論。「譯叢」和「西笑」貌似散播零碎的談資和輕鬆的笑話，實質上卻是雜誌文

人針對都市生活而表達觀點和宣示自我的重要平台。本文試以晚清「實用」理念為線索，透過追溯其內涵的演變，初步分析譯報的文本實踐，所涉原文和譯文文本，均鮮為學界探討，亦頗具歷史價值；對於重構民初雜誌翻譯場景，再思翻譯與譯者於民初社會的角色，或有幾分啟發。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上海伊文思圖書公司（1915）。新書來華預告。中華小說界，2（6），廣告頁。
- 上海強學會（1895）。上海強學會章程。強學報，1。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英華字典資料庫。取自 <http://mhdb.mh.sinica.edu.tw/>
- 中華書局（1914）。公民模範譯書廣告。中華小說界，1（8），廣告頁。
- 中華書局（1915a）。美國政治精義譯書廣告。中華小說界，2（8），廣告頁。
- 中華書局（1915b）。勤儉倫譯書廣告。中華小說界，2（9），廣告頁。
- 中華書局（1915c）。生活教育設施法譯書廣告。中華小說界，2（1），廣告頁。
- 中華書局（1915d）。新教育法譯書廣告。中華小說界，2（2），廣告頁。
- 中華書局（1915e）。中華教育界、中華實業界、中華學生界廣告。中華小說界，2（4），廣告頁。
- 中華圖書館（1915）。圖畫學譯書廣告。禮拜六，48，廣告頁。
- 天白（譯）（1915）。瑪伊亞公主小傳。禮拜六，65，33-52。
- 戈公振（1927）。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文明書局（1915）。足球規例譯介廣告。中華小說界，2（5），廣告頁。
- 文明書局（1918）。魔術大觀譯介廣告。小說大觀，11，廣告頁。
- 文豪呂碧城女士（照片）（1914）。香豔雜誌，2，插圖頁。

- 王勇（2014）。*東方雜誌與現代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鈍根（1921）。編輯室啟事。*禮拜六*，**135**，53。
- 北京繆子（譯）（1922）。自由婚姻之滑稽劇。*禮拜六*，**152**，9-10。
- 史九成（譯）（1914）。毒札（原作者：Arthur B. Reeve）。*禮拜六*，**8**，1-16。（原著出版年：1914）
- 世界瞭望塔（1923）。*小說世界*，**2**（1），頁數從缺。
- 吉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1959）。*中國近代史事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如深（譯）（1914）。愛波影。*禮拜六*，**2**，24-37。
- 何海鳴（1923）。求幸福齋贖墨。*紅雜誌*，**39**，14-17。
- 呂芳上（2001）。法理與私情：五四時期羅素、勃拉克相偕來華引發婚姻問題的討論（1920—192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9**，31-55。
- 呂碧城（1921a）。燭影搖紅。*禮拜六*，**118**，目錄背頁。
- 呂碧城（1921b）。美洲通訊。*禮拜六*，**122**，7-8。
- 呂碧城（1924a）。如夢令。*社會之花*，**1**，頁數從缺。
- 呂碧城（1924b）。浪淘沙。*社會之花*，**1**，頁數從缺。
- 李允臣（1921）。自由戀愛的結果！做尼姑。*禮拜六*，**141**，31-40。
- 杜慧敏（2007）。*晚清主要小說期刊譯作研究（1901—1911）*。上海：上海書店。
- 周瘦鵑（1914）。似曾相識燕歸來。*禮拜六*，**21**，1-14。
- 周瘦鵑（1928）。*禮拜六舊話*。載於芮和師、范伯群、鄭學弢、徐斯年、袁滄州（編）（1984），*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上）*（頁231—23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瘦鵑（譯）（1914）。無可奈何花落去（原作者：Madame de Staël）。*禮拜六*，**20**，17-29。（原著出版年：1807）
- 東方雜誌編輯部（1910）。投稿規制。*東方雜誌*，**7**（9），版權頁。

- 施濟羣（1923）。編輯者言。紅雜誌，15，目錄前頁。
- 禹鐘（1923）。街讖記。小說世界，2（10），頁數從缺。
- 唐振常（譯）（1922）。歐西笑談。禮拜六，191，7-8。
- 夏健秋（1922）。外國軒渠錄。禮拜六，143，26-27。
- 徐文烈（1921）。自由果。禮拜六，135，43-45
- 留美中國學生會（1915）。留美學生季刊廣告。中華小說界，2（7），廣告頁。
- 北巖爵士今晚抵滬（1921年11月20日）。申報，第五版。
- 婦女雜誌編輯部（1915）。新編婦女雜誌簡章。小說月報，6（1），廣告頁。
- 張潛鷗（1922）。婦女的心。禮拜六，173，45-49。
- 張靜廬（編）（1954）。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群聯出版社。
- 情人（譯）（1921）。瀛寰艷訊。禮拜六，115，12-13。
- 梁啟超（1896）。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時務報，1，1-2。
- 許步曾（2008）。尋訪猶太人——猶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陳薇（譯）（2006）。清末小說研究集稿（原作者：樽本照雄）。濟南：齊魯書社。（原著出版年：1992）
- 馮霽虹（譯）（1924）。西方諧談。紅玫瑰，10，46-47。
- 葉嘉（2009）。從「佳人」形象看《禮拜六》雜誌短篇翻譯小說（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 趙稀方（2012）。翻譯現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譯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 劉威閣（譯）（1921）。英國北巖爵士的譚話。禮拜六，140，6-9。
- 劉鳳生（譯）（1921）。海天拾雋。禮拜六，133，6-7。
- 劉鳳生（譯）（1922）。漫浪談。禮拜六，145，37-38。

潘光哲（2006）。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時務報》譯稿研究。史林，95，1-18。

編輯室（1921）。禮拜六，106，58。

尊（1910）。譯餘雜問。小說月報，3，頁數從缺。

憶秋生（譯）（1925）。捧腹談。小說世界，12（1），頁數從缺。

嚴獨鶴（1924）。發刊詞。紅玫瑰，1，1。

英文文獻

Bert L. Kuhn (1926, February 21).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Archive, 1851-198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ref/membercenter/nytarchive.html>

Lord Northcliffe at Shanghai (1921, November 21). *The Times.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1785-2006*. Retrieved from <http://www.gale.cengage.co.uk>

Rain is blamed for matrimonial ventures (1921, April 4). *The Dalles Daily Chronicle. Historic Oregon Newspapers*. Retrieved from <http://oregonnews.uoregon.edu>

Rockefeller trip to China (1921, July 31).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Archive, 1851-198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ref/membercenter/nytarchive.html>

Roscoe Arbuckle faces an inquiry on woman's death (1921, September 11).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Archive, 1851-198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ref/membercenter/nytarchive.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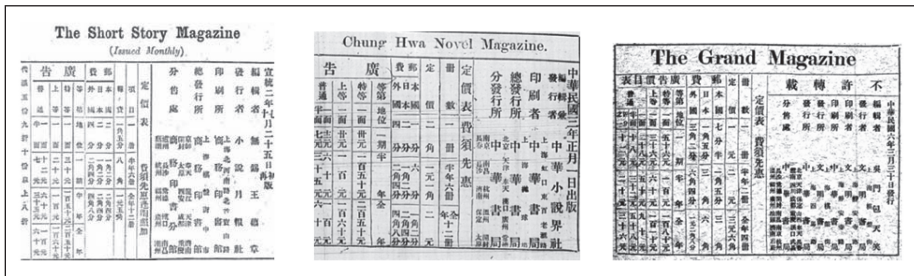
To dedicate Peking institution today (1921, September 19).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Archive, 1851-198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ref/membercenter/nytarchive.html>

Britton, R. S. (1966).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ing-Wen.

Reeve, Arthur B. (1914). The Germ Letter. *Cosmopolitan*, 57(2), 244-263.

附錄：論文所涉雜誌的英文名稱

上排由左至右：《小說月報》(*The Short Story Magazine*)、《中華小說界》(*Chung Hwa Novel Magazine*) 及《小說大觀》(*The Grand Magazine*) (封底)



下排由左至右：《禮拜六》(*The Saturday*)、《紅雜誌》(*The Scarlet Magazine*) 及《小說世界》(*The Story World*) (封面)

